

一月份工业生产接近去年十二月水平

要再接再厉，做好节日生产组织工作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一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形势喜人。扣除去年一月过春节休假这个不可比的因素，按实际工作日计算，今年一月全国工业平均产值比去年一月增长百分之八点七，接近去年十二月的水平。

我国各地工业部门今年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一开始就抓紧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去年一月份比较，全国原煤产量增长百分之八点九，发电量增长百分之十点八，氮肥、磷肥各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小型钢材、线材、薄钢板、带钢、焊接钢管等短线钢材分别增长了四分之一多，水泥、平板玻璃、塑料、汽车、汽车配件、工矿配件也都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全国一百种主要产品产量，绝大多数比去年一月增长，其中六十八种还超过了去年十二月的产量。与此同时，全国工业企业的上交利润也有所增长。

一月份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优先发展轻纺工业，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轻纺工业的平均日产值比去年一月增长百分之十七，远远超过了重工业增长百分之二点五的发展速度。列入国家计划的二十三种主要轻纺工业产品，今年一月份的产量都比去年一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纺织工业品化纤、纱、布、呢绒、毛线各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轻工工业品卷烟、自行车、缝纫机、表分别增加四成左右，电子工业品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的产量更是成倍增长。整个轻纺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去年为百分之四十三，今年一月份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六点一。

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生产，今年一月比去年一月普遍增长，其中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湖北、湖南、江西、云南、青海九个省、市还超过了去年十二月的水平。

国家经委肯定了一月份工业生产的成绩，同时指出决不能有任何松劲情绪，特别是少数地区动力和某些原料、材料供应不足，安全生产情况不够好。现在春节临近，各地工业部门要再接再厉，增产节约，特别要做好节日期间生产组织领导工作，努力把我国工业搞得扎扎实实，做到稳步发展，持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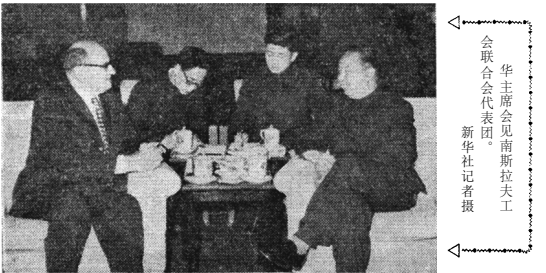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这里说，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为托托同志很快恢复健康感到十分高兴。

在会见由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南工联会联合主席托托同志率领的南斯拉夫工联代表团时，华国锋同志说：“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十分关心托托同志的病情，托托同志这么快恢复了健康，现在已能处理一些日常工作，这确实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他请米卡·什皮里亚克同志转达他对托托同志的诚挚问候。”

米卡·什皮里亚克同志在谈话中指出，不久前出的一些舆论，猜测托托同志可能会发生某些问题，这些猜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南斯拉夫党始终不渝地执行不结盟政策，决心保卫独立，永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华国锋同志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斗争考验的南斯拉夫人民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党，南斯拉夫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们党和人民完全相信，南斯拉夫人民是能够取得任何胜利，朝着托托同志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华国锋同志还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问题，并说，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同南斯拉夫同志交换了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南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康永和、黄民伟等，参加了会见。南斯拉夫工联代表团副委员长托托奇也参加了会见。南斯拉夫工联代表团副委员长托托奇也参加了会见。南斯拉夫工联代表团副委员长托托奇也参加了会见。

（下转第二版）



华主席会见南斯拉夫工联代表团。新华社记者摄

中泰友好关系将更加密切

哈林议长盛宴欢迎邓副委员长

新华社曼谷二月六日电 泰国国会议长哈林·宏沙军今晚在欢迎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的宴会上说：“邓颖超两国的此次访问使得我们两国现有的亲密友谊更加密切了。”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宴会讲话中也说：“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八十年代中泰友好关系更加灿烂的前景。”

今晚泰国议会大厦灯火辉煌。哈林议长和夫人举行的这次盛大宴会，用的是中式菜，更增添了亲切友好的气氛。席间，泰国总理江萨、国会议长哈林和最高法院院长巴托·提拉瓦一起演唱了泰国著名歌曲《白莲花》。邓颖超副委员长也在江萨总理的邀请下唱了歌曲《白毛女》中的歌曲《北风歌》的一段。中泰两国领导人这种兴起的唱歌表演，把宴会愉快而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接着泰国外长乌巴带火辉偕同中国驻泰国大使张闻天的夫人许恒同一起演唱了一支他在五十年前

学会的一首中国儿歌。江萨总理对今晚的宴会感到很高兴，他对邓副委员长说：“今天晚上的宴会表明，泰中两国有着密切的友谊，我们象亲戚般地打成一片。”

（下转第六版）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举行全体会

听取关于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情况和学位条例（草案）、国籍法（草案）说明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十三次会议，今天下午举行全体会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韦国清、彭真、谭震林、赛福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出席了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列席了会议。

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会上代表国务院汇报了全国进行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去年下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据最近统计，全国已有六十六个县、自治县、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鉴于县级直接选举是一项新的工作，为了切实把这项工作搞好，国务院建议，今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继续做好准备工作，扩大试点范围，以便取得更多的经验；下半年分期分批开展县级直接选举。

在今天的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的说明，并请各位委员提出修改意见。

全国物价会议确定今年物价工作方针

从安定团结出发确保物价基本稳定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一九八〇年物价工作的方针和中心任务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切实加强物价管理，继续开展物价的检查整顿。农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要严格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作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同时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研究和试点工作。

这次会议是在一月四日到二十三日召开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国务院

五座标联动数控铣床制成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五日电 北京第一机床厂在兄弟单位大力支持下制成我国第一台能够加工万吨级远洋货轮上的大型螺旋桨五座标联动数控铣床。最近，经有关部门鉴定，认为这台铣床的结构、布局等方面的设计是成功的，其中铣床的条形分离导轨，自动螺旋距测量和回转头的设计，有独特的风格，制造质量良好，某些性能接近国际上同类机床的先进水平，目前这台铣床已在生产上使用。

重庆制成离心式制冷机组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五日电 我国自行设计的每小时能制冷冷气二百四十万大卡的离心式制冷机组，最近在重庆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并已提交用户使用。它是在有关单位协助下制成的。

这套制冷机组可以用于化纤、纺织、化工、电子等工业部门及大型建筑作空气调节设备。在设计、研制过程中，广泛采用了国内外先进技术。

确保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计划价格的变动，一定要十分慎重。可调可不调的坚决不调，必须提价的也要尽量少提，绝不能再开大的口子。

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加上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挫折，现行的价格体系，包括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农产品和工业品内部的比价关系，都有不合理的地方。从某种商品的具体情况看，要适当调价，可能是有道理的。但从全局看，为了避免连锁反应，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调价是不适当的。一些具体商品的价格问题，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分期分批解决。只有承认和暂时保留局部的不合理，才能保证全局的大合理。只有保证全局的大合理，局部的不合理才能更快地得到解决。这是局部服从整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同志，一定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稳定市场物价，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局上来，绝不能自行其是，因小失大。当然，稳定物价不是冻结物价。（下转第二版）

安定团结保证四化建设顺利进行

形势和任务报告时一致指出，动乱只能后退，安定才能前进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动乱只能后退，安定才能前进。这是出席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委员，在讨论邓小平同志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一致的意见。

两天来，委员们在讨论中谈到安定团结对四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安定团结是搞经济建设的根本保证。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国人民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要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努力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坚决同一切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的人和事作斗争，维护和取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许多委员说，我们八十年的任务是极其繁重的。在这十年中，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要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要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而最关键的一条是搞好国内建设。要搞好国内建设，就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良好环境。一些委员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说，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十多年间，武斗盛行，打砸抢成风，搞得干部挨批斗，群众不安宁，人们没有心思搞生产。粉碎“四人帮”后，有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各条战线的工作恢复和发展较快。经验证明：动乱，生产下降、人民吃苦；安定，生产发展、人民高兴。

一些来自农村基层的委员结合各地的情况指出，安定团结太重要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后进一步落实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发展的两个文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绝大部分地区社员收入增加，市场繁荣，广大农民心情舒畅。这虽然是靠了方针政策，但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取得农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根本不可能。

在讨论中委员们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也必须看到，各地还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流氓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没有改造好的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也还存在。“四人帮”组织上、思想上的某些残余更不能低估。特别是有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他们往往打着“民主”、“人权”之类的旗号进行捣乱和破坏活动，对这种人更不能丧失警惕。还有少数人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有的人还热衷于搞派性活动。委员们指出，对这些人员一定要严加注意，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能教育的要尽力教育，能挽救的要尽力挽救；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的，只要认识和改正错误，改了就好；构成犯罪的，如果能够认罪并悔过自新，可以宽大处理；对那些构成犯罪而又顽固不改的，就要坚决依照法律进行制裁，决不能手软。

许多委员指出，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维护安定团结的。对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法律措施要从严，这不但是搞好社会安定所必须的，对各种犯罪分子是个教育，而且对全国人民也是一种法制教育。第十二次常委会处理了“西单墙”问题，推动了各地类似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各地人民拍手称快，都说这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可见，人心思安定，人民要团结，动乱是不得人心的。在讨论中，与会委员认为，八十年代，我们的任务紧迫而繁重，一天也不能马虎，一天也不能耽误。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都要十分珍惜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努力消除不安定的因素，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能节外生枝，不得各行其是，真正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胡乔木同志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说

报刊要为巩固安定团结做贡献

本报讯 “报纸、刊物要成为实现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舆论的向导。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运用手中的新闻工作的武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任务，为促进和巩固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努力做出贡献。”这是北京新闻学会名誉会长胡乔木同志在学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一段话。

胡乔木在会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在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是有科学根据的，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全国人民有共同的信念和信心。我们所以有力量，在于我们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遵循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纪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目標而共同行动。我们要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我们每天的勤务工作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团结一致，充满信心地为实现四化而奋斗，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切实加强管理 稳定市场物价

最近召开的全国物价工作会议确定了一九八〇年物价工作方针：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切实加强物价管理，继续开展物价检查整顿。这个方针适应调整国民经济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不仅物价部门必须坚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也应当统一认识，协同动作，认真贯彻执行。

物价问题，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尖锐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调整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农业生产增长，农产品收购、供应情况显著改善，轻纺工业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速度。全国各地市场日趋繁荣。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次调整价格是必要的、成功的。与此同时，由于调价品种多，幅度大，引起

的连锁反应相当广泛，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统筹兼顾，妥善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说明：我们的物价，一定要保持基本稳定，否则会引起经济生活的紊乱；但也要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否则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就是说，要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稳定和调整是辩证统一的，在某一时间段侧重调整，某一段时间又侧重稳定。一九七九年较大幅度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以后，市场物价需要稳定一段时间。从政治上说，这是安定团结的需要；从经济上说，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需要；从工作上说，在经过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以后，需要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整顿提高。因此，一九八〇年物价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上年调价遗留下来的问题处理好，把连锁反应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小程度上，



社论

“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怀念王其梅同志

谭冠三 陈明义 李 觉

十二年前，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党的忠诚战士王其梅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残酷迫害下，蒙受不白之冤，含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其梅同志得以平反昭雪，并根据他生前意愿，将他的骨灰移回西藏安葬。

其梅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那光明磊落的品质，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一）

王其梅同志是湖南省桃源县人。三十年代初期，为了追求真理，寻求革命道路，他离开家乡到北平读书，积极参加了光复党的学生运动。一九三三年七月，其梅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正在大学读书，党组织派他去作兵运工作，他毅然放弃大学学生的生活，投入国民党军界，当伙夫、车夫、勤务兵和马弁，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节节向晋、察、冀、绥、热等地侵犯，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招致了华北危机。其梅同志奋起从事救亡工作，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担任了北平学联的交际股长，他不辞劳苦，奔走于街头巷尾，宣传组织群众。一九三六年春，由于叛徒的出卖，其梅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气节。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并按党的指示，打入河南省东部西华县，从事这一地区的开辟工作。

初到豫东，其梅同志在西华农村创办了一个名为“普理”的学校。他忍受着狱中受刑致残的创痛，紧张地工作：白天教书，夜晚联系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为后来成立党的抗日武装，训练和准备了一大批干部。一九三七年春，豫东发生大春荒，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其梅同志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内部矛盾，以合法斗争为手段，发动群众，领导饥民分了一家恶霸地主的多年陈粮，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基本群众得以度过春荒。第二年，当日寇铁蹄踏在豫东大地上时，又遇上一次大春荒。其梅同志一面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抗日；一面带领群众拦截了奸商运往敌占区资敌的十七船粮食，并就地分粮于民，使数万饥民得救。此后，西华地区一带的男女老幼，无不称赞为穷人办好事的“王先生”。这个分粮救人的故事，至今在豫东人民的口碑中流传。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滔滔洪水泛滥四十余县，西华县成为黄泛重灾区。在人民遭受空前大灾难的关头，其梅同志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当地群众和进步青年，帮助群众脱险，转移到安全地区。不久，其梅同志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没有武器，他想方

设法筹集；没有军事干部，他亲自领导训练，终于建立起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在睢县、杞县、太康等地创建了豫东抗日根据地。

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西临平汉、北靠陇海两大铁路，是我华中、华北两大战略区的咽喉通道。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开封和商丘、徐州要地；同时，在我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架起了一座紧密联系的桥梁。一九四〇年以后，日寇频繁地对这一地区进行“扫荡”，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由于其梅同志依靠群众，机动作战，灵活地打击敌人，特别注意到摧毁伪政权、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武装，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胜利。

当时，王其梅同志的名字，一再出现在敌占区的报纸上，成为“新闻人物”。敌人听说司令部的军队来了，往往龟缩在据点里不敢乱动；人民群众听说其梅同志带领的队伍来了，扶老携幼，出村相迎，簪食浆，慰问自己的子弟兵。其梅同志领导的这支鱼水之情，后来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休戚相关，建立了血肉关系。这支武装成为第二野战军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战斗在豫、皖、苏地区。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其梅同志不仅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率先同民族敌人英勇作战，而且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当时西华县有一位爱国进步的知名人士胡晓初，带有两千多人的武装，是一支重要的地方势力。其梅同志排除“左”的干扰，作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胡晓初于一九三九年冬决然地拒绝国民党的改编，率部参加了我军，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一部分。在睢杞太地区，国民党顽固分子薛海军队制造磨擦，经常袭击我根据地，抢掠我人民群众的财产，打死打伤我我机关干部，严重影响这一地区的抗战大业。其梅同志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坚决予以回击，歼其大部，巩固了豫东抗日根据地。

（二）

一九五〇年春，为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伟业，我军奉命向西藏进军时，其梅同志担任了“前指”政委，为大军西进作开路先锋。他除了组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外，率部跋山涉水，首先解放了西藏的东大门卢昌郡，打开了进军拉萨的通道，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重要条件。一九五一年，为贯彻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配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的行动，其梅同志又奉命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进拉萨，再次担负起了大军开路的重任。从边坝到太昭（工布江达）间的八天路程，是川藏道上极为险恶的“恶八站”。这里山高路险，鸟兽罕见，忽而曙光万里，忽而风雪交加，异常寒冷。其先遣支队到达这里，中途濒于断粮。其梅同志带头以马料掺和野菜充饥，号召部队学习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

的坚韧不拔精神，发扬阶级友爱，终于胜利地到达太昭。

在艰苦的进军途中，其梅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决贯彻西南局、西南军区刘伯承、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各项具体指示。要求部队处处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以身作则，成为部队的表率。他耐心地向当地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征求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他对广大藏族同胞寄以无限同情，解决他们的切身困难。在补给不继时，他宁愿和战士干部挖野菜度日，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违犯群众利益。日久天长，广大藏族同胞逐渐消除了对解放军的误解和疑虑。有的藏族看到部队吃野菜，便把整袋的糌粑放在部队的驻地门外。我军空投落在深山的整箱银元，也被藏族拣回悉数送还。部队从甘孜出发，许多藏族赶着牦牛和骡马，把成万驮军需物资，运往金沙江边。这一幅幅藏族军民团结互助的画卷，都渗透着其梅同志的心血。

其梅同志率军进抵拉萨后，有些反动分子一方面散布谣言，煽动藏族反对我军进驻西藏保卫祖国边疆；另一方面则向我外出人员拉膀子、扔石头，寻衅闹事，形势相当紧张。面对这一现实，其梅同志非常镇定从容。他一方面将上述情况及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方面要求全体指战员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把反动的谣言制造者、唆使闹事者，同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区别开来。他经常轻骑简从，登门拜访僧俗官员、各界人士，晓以团结爱国的大义，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风俗和习惯，到寺庙去朝佛和布施。他号召部队遵守纪律，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以实际行动戳穿反动分子的诬蔑和挑拨，不给敌人以任何口实，从而稳定了西藏局势。

不久，为了尽快打通川藏公路，解决运输补给问题，组织上又把其梅同志派往后方，领导筑路。时值隆冬，组织上曾考虑要他取道国外，但其梅同志为了不给国家增加外汇开支，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从拉萨出发，沿着进军西藏的道路，回到内地，表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到了工地，他深入实际具体解决筑路中的棘手问题，克服重重困难，使这一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大动脉，胜利地提前通车。

（三）

其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毕生为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高尚品质，表现在高度自觉的党性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上。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和利害。他受过严酷的白区工作的考验，在敌人的监禁拷打下，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铮铮硬骨头，皎皎如日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豫东平原，在敌伪顽的分割夹击下，他英勇作战，顽强坚持。三个前任地委书记牺牲了，他毫不气馁，更加坚定地战斗下去；负了伤，仍继续战斗；没有饭吃，他同战士一起吃树叶子和红薯叶子；当部队需要集中马匹建立骑兵部队时，他首先把自己的乘马交出去。

其梅同志在读书和学习上从来是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他常设法弄到各种书籍，挤出时间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文件，他总是认真精读，作眉批笔记，写心得体会，力求领会贯通。他经常讲，一个革命者如果学习不好，干起工作盲目性就大，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出偏差。他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把关心国家大事和努力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从而为革命大业作出出色的贡献。

其梅同志一贯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处处严于律己、模范带头。他亲身参加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伟大事业。他带头和战士一起盖营房、修公路、建水电站、开荒种菜、植树造林。有一次栽果树时，个别别人嘟嘟囔囔地说：“栽它干嘛，我们吃果子，还不如种下来吃果子呢？”其梅同志严肃地指出：这句话看来无碍大局，但反映的思想却不可轻视。他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对干部们说：“我活着和大家一起干革命，建设新西藏，死后也要把这副棺材埋在西藏。”其梅同志身患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等疾病，中央曾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调他到北京工作。但其梅同志认为：西藏是个艰苦的地区，自己对西藏的情况熟悉，个人的身体小事，建设西藏大事，应当继续留在工作。后来，当他得知中央同意了意见后，高兴地说：“我又留下了，再也走不了。”其梅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热爱边疆、热爱西藏的革命精神，为西藏地区的指战员和工作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当其梅同志被“四人帮”一伙迫害得生命濒于垂危的最后最后一息时，仍念念不忘西藏的工作，不忘西藏建设的大业。就在这样的时刻，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艰难地写下了最后的遗言，即他以自己的心血总结出的《对西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在他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再三地嘱咐他爱人王先梅同志说：“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其梅同志作风正派，真诚待人，密切联系群众，从不在政治上搞特权、生活上搞特殊。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而反对摆在群众之上。他常以古代历史的教训为鉴，特别是对那种太平盛世世中的文恬武嬉、奢侈豪华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并告诫干部要引以戒为。一九六〇年，他曾把多年节省下来的一万多元津贴，全部交给。由于积劳成疾，上级机关和医生再三催促他到内地疗养，他总是迟迟不前。最后，无法再拖延下去时，他才在青岛住了仅有的一次疗养院，还带了一位教课室的教员，住了一个多月的藏语。

王其梅同志去世时，年仅五十三岁，正是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这是令人十分悲愤和惋惜的。今天，我们悼念其梅同志，要学习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品德，以此来砥砺我们自己，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以便更好地团结在我们党中央周围，焕发精神，奋发图强，为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回忆刘芝明同志领导文艺创作的民主作风

姚仲明 金紫光 李 伦

刘芝明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去世，已经十一年了。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和很多同志的心情一样，在他欢庆的同时，也深深地怀念他。

芝明同志原名陈祖寿，辽宁盖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一九二九年学成归国后，就在上海以政法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身份，进行党所领导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负责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上海反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上海东北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当党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保障大同盟的党团书记被捕后，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刘芝明同志挺身而出，继任了这个工作职务，并且更为积极、活跃地展开工作。当“九一八”后，一批从上海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中有人被杀害，芝明同志等当即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上海学生抬棺游行示威，沿途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勇敢地冲过反动军警的重重封锁，冲过了法租界的铁门，在上海人民群众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三三年，刘芝明同志作为在上海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作为东北人要求抗日，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监狱中，他目睹革命先烈邓中夏同志英勇就义前那种坚贞不屈、浩气长存的革命英雄气概，更加激发了革命斗志。同志在黑暗的监狱中永远向往着光明的未来，以极大的毅力学习了德文和英文。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经我党代表周思来同志亲自营救，刘芝明同志与同狱的陶铸、王鹤寿等同志一道获释出狱，旋即转赴延安。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止，刘芝明同志先后在延安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务处长主任、第三部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并兼任延安研究院院长。

他不仅在教育工作方面成绩卓著，特别值得一谈的是他在领导文艺创作、演出活动方面的巨大贡献。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芝明同志自觉地、主动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和方针。我们当时在刘芝明同志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分别参加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

路》、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新歌剧《刘红英》及秧歌剧《牛水贵负伤》等的创作、导演、演出工作。我们的写作水平是很低的，经验也很少，如果没有芝明同志的帮助和支持，这些作品不但不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还会有中途夭折的可能。当《同志，你走错了路！》的作者姚仲明同志向芝明同志谈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他连声说：“好，我一定支持！”当即热情地鼓励作者大胆进行尝试，并帮助解决有关的具体困难。当作者把初稿拿出交群众讨论后，由于意见分歧，作者几乎准备放弃原作。但芝明同志却认为，反映向八路军路线作斗争的戏有难度，但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应当坚持搞好。并说文艺创作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党和阶级的事业，有什么困难组织上可以帮助解决。接着便从党校三部调塞克和陈琼凡同志前来，参加导演工作。在芝明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这个戏终于获得了成功。

歌剧《牛水贵负伤》的创作演出是在一九四四年春。为了贯彻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芝明同志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大秧歌队，组织党校的文艺干部编写了一批秧歌剧，其中周而复和苏一平同志合写的《牛水贵负伤》，在演出中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刘红英》是在秧歌队基础上提高发展而成的一个新歌剧。剧情主要是反映陕北某红军战士离家出征赴华北抗战，家属刘红英在家中坚持生产劳动，支援前方抗战，同时克服各种困苦抚养子女并坚决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演出后，观众深受感动，许多人情落泪；但也有人认为，这出戏的剧情太悲，看了以后使人家想，影响情绪，有副作用。这些评语使作者、导演都感到有压力，思想上有顾虑。这时芝明同志及时地对编剧苏一平、周文，作曲金紫光等同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和引导大家继续努力改进，千万不能松劲。由于芝明同志对

同志亲切关怀、对工作极端负责，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们，不但心情舒畅，而且能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三打祝家庄》的创作，是彭真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请刘芝明同志亲自抓的。这是由于中央党校几个部的教职员和工勤战士等业余创作演出的剧目。参加的人员来自各个不同岗位，思想文化水平相当悬殊。大家临时组合在一起，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外行”，要想在短时期内创作出这样一部大型历史剧，真是谈何容易！为了充实、丰富作者所要反映的生活，芝明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并请熟悉梁山的同志介绍梁山的民间传说和情况，请刘宁一、刘慎之等同志介绍地下工作的事例，请一些军事指挥员同志介绍应对外合破敌堡垒的具体事例，请郭化若同志从军事理论原则方面给予指导，请萧长清同志参加一期创作会。剧本经过数次修改后，又多次听取导演、演员和特邀顾问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演出后又多次征求意见观众进行修改。在集体创作中作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芝明同志又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敦促团结的工作。

芝明同志在创作的领导工作中表现出许多优点，他的民主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各种文艺作品，往往都是仔细阅读数遍之后，才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提出意见时，他又总是把自己放在作者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允许进行讨论，并启发作者充分讲出自己的意见。有时，由于彼此意见不一致，几个作者情绪激动，甚至拍着桌子同他吵起来，有时他同意了作者的意见，有时他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甚至情绪也有些激动，以致闹得不欢而散。但是，次日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不存任何芥蒂，又接着对作品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感到：一个领导干部能使作者敢于对他直率地讲心里话，甚

至敢于当面同他吵起来而事后又毫无戒心，如果不是他具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那将是难以设想的。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领导工作来说，也还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芝明同志在文艺创作领导工作中，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也是很突出的。他总是很注意组织和引导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进行深入体验和调查研究，即使作者在已经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他也要坚持这样做。目的是帮助作者加深对于生活本质的认识，使作品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在作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戏剧性较强的情节等等，往往是在对生活的深入过程中获得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他总是耐心地引导作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高度集中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而又保持和发展了作品原有的独特风格。

芝明同志对作品既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又要求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我们的剧本之所以一再修改，政治水平不高固然是一个原因，艺术水平不高也是一个原因。在明同志为了提高作者的政治、艺术水平，在政治报告、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方面，在学习文艺理论、技术、观摩文艺演出和业务进修等方面，他都设法给作者以方便条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形势，能站得高、看得远，洞察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尽可能在作品中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生活与艺术的统一。我们以为，正是由于芝明同志的这些作法符合于艺术的创作规律的要求，所以，《同志，你走错了路》、《刘红英》、《牛水贵负伤》等剧的创作、演出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重视和欢迎；《逼上梁山》才会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三打祝家庄》才会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巩固了平剧

革命的道路”。这两出戏才会在各解放区广泛演出，受到欢迎。

一九五三年，刘芝明同志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六二年以后，调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代理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艺路线，坚定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和文艺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芝明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但他宿舍中除了很多装满书籍的书架和简单的用具外，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他使用一块陈旧的怀表，穿着十分简朴。他对机关里的同志们，不管是干部还是公务员、炊事员，都主动接近，有时到家中访问，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朋友们也愿意接近他，认为他是一位可亲近的、能谈得来的领导干部。他兼任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时，听说有些演员对他有意见，他就从党校渡河走到平剧院这些同志的窑洞中，坐在一起，虚心地向大家对自己的意见。演员们为了芝明同志的这种举动所感动，诚恳地提了工作、伙食等方面的意见。芝明同志认真考虑这些意见，有的立即采纳实行。在供给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平剧院伙食的伙食品种立即大加改善，受到全院同志的欢迎。

若干年来，在他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创作了许多流行全国的优秀文艺作品，但他从不居功，全都归功于作者，对自己只字不提，甘作埋头苦干无名英雄。他担任东北文化部长时，有位作者需要安静的创作环境，他便请作者住在自己的楼上，他自己则住在楼下，以便向作者的来访者“挡驾”。刘芝明同志身上保持的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和崇高品质，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消费基金大大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减少。比例关系的这样大的调整，当然不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困难。最突出的表现，一方面是市场商品供应可能比较紧张；另一方面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机器设备等类生产资料的需要量大减少，机器制造业和一部分基建队伍有可能闲置起来。调整本身就是国民经济结构的改革，决不是单纯的资金分配的变化。如果不相应地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内部的经济结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有必要使一部分重工业生产，转移到为人民生活需要服务的轨道上来。不但要大量制造轻工业品，而且也要为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工业生产发展方向的调整，除通过生产计划来实现外，还必须广开生产门路，要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同时也要加强指导，交流情报，进行协调，防止盲目性。许多工厂的需要，特别是人民生活的需要种类繁多，其中大部分不可能列入国家计划。我们必须给企业以按照市场需要灵活安排生产的机动权，鼓励生产任务饱满的企业，在完成生产任务以后，自找门路，生产各种各样生产单位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最近华国锋同志号召我们各经济部门、基层企业广开生产门路，指出这样做潜力很大，大有可为，这是一九八〇年经济工作中一个重大任务。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最困难的恐怕是机械制造业。我国机械制造业工厂多，设备多，工人多，生产效率很低，这已经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老问题。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以后，机器设备的需要量减少，产销之间的矛盾将要更加突出。但是，机械产品是否有销路呢？显然不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有许多计划内的产品大量积压，一方面有许多计划外的产品大家都不生产，用户要四出奔走，到处请求，才能找到一个工厂替它制造。现在中央号召挖潜、革新、改造，执行这个方针，就要更换或者添置一些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绝大部分没有列入生产供应计划，而且大多数是大批量生产，在过去，一般工厂是不肯接受的。为着研究试制新产品，改造老产品，生产奇巧的工矿设备，也需要各种计划外的机器设备。如果各工厂都只管生产计划内的产品，就肯定吃不饱。如果利用多余的生产能力，广开生产门路，增产计划外的产品，情况就会大大变化。无锡市县工业以至轻工业中机械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由于中央号召停止生产积压的机械产品，许多工厂面临着下马的危险。一九七九年中央各部和外省纷纷要求它们制造各种计划外的产品，结果变成“吃不饱”为“吃不了”。市县负责同志说，他们的机械产品，计划内的只占百分之四十，计划外的占百分之六十。在各工厂的挖潜、革新、改造大规模展开以后，计划外产品的需要还会大大增加，在这方面真是大有可为。

我国有些机械工业产品质量好，可以外销。印度机械工业不如我国，外销机械产品不少。外贸部门应当努力向国外推销我国的机械工业产品，并允许工业部门到香港等地去举办展销会，为我国的机械工业产品在国外打开销路。

机械制造工业还可以改产市场需要的缝纫机、自行车以至铁制家具等消费品。现在军工厂也兼产民用

调整国民经济中要广泛寻找生产门路

本报特约评论员

产品，不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且争取出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今后要支持、鼓励。对计划外产品所需要的钢材和其它物资，要尽可能供应。这样不是会使钢材供应过于紧张吗？只要安排得好，这个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前几年钢材供应年年有很大的“缺口”，但吃钢材最多的机械工业往往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钢材库存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大量积压，这说明有些“缺口”是虚假的。往往生产计划的部门领了一份钢材，需要机械的部门也要领到一份钢材。无锡生产计划外的机械产品不缺钢材，可以证明。无锡钢材的需要不是固定的，常常随基建投资的多少而增减。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压缩基建投资，钢材需要也会随之减少。只要我們想方设法利用一千九百万吨库存钢材，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当然，这样做会牵涉到现行的生产管理体制和物资供应体制问题，因此调整 and 改革必须相辅而行。广开生产门路和广开就业门路一样，不改单经济管理体制，打破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是会到处碰壁的。

在调整中还会发生许多基本建设队伍没有活干的问题，也应当设法解决。解决办法，首先是把下马项目的力量量去支援下马的项目，加速工程进度，完成收尾配套工程。其次是，现在许多城市的住房建设十分紧张，许多工厂挖潜、革新、改造，也需要一些建筑安装等临时工。可以考虑由劳动局和有关部门来共同商量，把这些暂时闲置的劳动力尽可能利用起来。

不但重工业要广开生产门路，轻工业也要广开生产门路。从一九五六年前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完成以来，市场商品的品种花色是大大减少了。这同商业部门的统购包销有关系，今后必须逐步扩大选购和自销的范围。去年上半年轻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曾经下降，下半年已转变为升。轻工业生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商业部门实行选购以后，许多质次价高的产品不收购，只能停产整顿，这是必要的。也有许多产品实际上有销路，商业部门认为无销路，不收购。准许企业自己销售，很快也就卖光了。所以选购与自销不能分离，凡是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应当准许工厂自销，不要商业部门一家包办，更不要层层重查，要准许工厂零售商店直接挂购。要奖励工厂生产新产品，改进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花色。鼓励商业的新产品，准许工厂自销一个时期，或者商业部门提价收购。

为着鼓励轻工业、手工业、服务业广开生产门路，必须改革工商关系。三大改造时期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目的是通过国营商业来控制私营工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工业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同商业应当处于同等地位，再用商业来管工业，就会把工业管死。以服装生产为例，现在服装生产都由商业部门向工厂加工订货，有些地区商业部门规定的样式过于陈旧，销路不畅，要求工厂压缩产量。工厂自己生产新式服装，供不应求，但是布匹由商业部门统一分配，工厂自己无权扩大生产。由于成衣式样、规格过于单调，人民要求量体裁衣，排队异常困难。有些城市提倡广泛发展服装生产合作社，但合作社没有缝纫机的分配指标，

更没有布匹的分配指标，办不起来。穿衣是人民生活中仅次于吃饭的大问题。人民生活改善以后，再不能老是这样单调，总要慢慢地做到丰富多采。这就需要我们在经济管理上扩大工厂的自主权，不要把它们的手脚捆起来，使它们有可能放手广开生产门路，生产适销产品。在轻工业、手工业生产中，这是一个相当普遍、必须迅速解决的问题。

要广开生产门路，还要解决生产和需要双方如何能够见面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工商企业都大做广告，推销人员满天飞，而是采购人员满天飞。在实行选购自销制度以后，工厂就必须关心市场的需要，加强产品的推销工作。有许多工厂生产的产品，往往找不到销路；而需要这种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则到处奔走，难于采购。为把产销双方联接起来，有必要恢复广告业务。最近报载“一张广告救了一个工厂”，说湖北有个保温材料工厂，由于产品没有销路，将要关闭。登了一个广告，各地纷纷前来订货，滞销品变为畅销品。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相当普遍。北京西单商场最近销售机电产品，生意兴旺，用户、工厂和商场都很满意。最近有许多工业部门举办“展销会”，效果很好，也可以提值。但一个渠道显然是不够的，有必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产销之间传递信息。旧社会有“跑街”、“掮客”之类为产销双方牵线的人员，现在也可以专设某种公司，接受产销双方的委托来解决产销不能直接见面的困难。

广开生产门路还有可能受到现行工商管理、税收制度、价格政策等方面的限制。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就应当允许跨行业生产，跨地区销售，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产自销，某些新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准许减价免税，不属于统配、统销的产品，在一定范围内准许由产销双方自己议订价格。滞销商品应当采取薄利多销政策。北京酒厂生产的红宝石酒，一公斤成本二百二十余元，售价一千一百元，大量积压，准备作价。后来把售价降到四百九十元，比进口价格低，立即变为畅销品。上海生产的台式电子计算机也曾经因售价太高，严重积压，停止生产。降价以后，存货全部卖完，现正增设工厂扩大生产。

现在各主管部门制订的许多规章制度，不是广开生产门路，而是堵塞生产门路。例如山区利用竹木材料制造各种小商品，由于主管部门在运输、销售方面设置重重障碍，当地积压，外地脱销。现在许多地区已经有所改进，但是仍很不普遍。当然，广开生产门路，也要加强领导，以免盲目发展。

城市要广开生产门路，乡村也要广开生产门路。我国耕地少，人口多，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农村中也出现劳动力的安排问题。解决办法，不是叫农民进城，而是在乡村中广开生产门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许多正当的家庭副业甚至社队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了。许多地区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有偏差，山区毁林造田，牧区毁草种粮，水乡围湖造田，把林、牧、渔业破坏了。有些经济作物区也要粮食自给，使许多种赚钱多的经济作物也受到破坏。这样，生产的门路愈缩愈少，这是目前农村劳动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农村也要广开生产门路，让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还要发展社队工业，把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改造成农工商联合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无锡县是人多地少的地区，每人平均只有八分耕地。近十年来由于发展社队工业，工业的产值已经显著地超过农业的产值。由于用社队工业的积累支援农业，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快于其他地区。无锡县靠近上海，无锡市本身也是一个老工业区，退休的老工人多，发展社队工业有其它地区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特别落后的山区、牧区能不能发展社队企业呢？我们到皖中、皖南山区调查，发现山区的资源非常丰富，很容易利用来发展社队工业和手工业，这里有许多山货土产在大城市是难于买到的。在这里发展社队企业，条件也很优越，关键是要解决运输问题。据供销合作社的负责同志说，安徽省的葵花子、蓖麻子和其它山货的产量，比解放初期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主要原因是那时候有小商贩来收购运销，现在小商贩没有了，供销社合作社人少面广，产品种类繁多，无力独家包办。再加上前三年“四人帮”的干扰在安徽“资本主义尾巴”，连农民扎扫帚都要禁止，使安徽的社队企业下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

农村当然应当以农业为主，增产粮食，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发展各种种植业、养殖业。同时应当利用当地特殊条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山产吃草原，发展畜牧业、牧、渔业外，还要发展这些产品的加工业。这些生产事业发展起来以后，必须解决产品的运销问题，改变目前流通渠道堵塞的现象。供销社合作社应当大力收购运销各种农副产品特产，人民公社自己也可以设立运销机构，来销售自己的这些产品。或者由组织社员收购各种土特产品，交给供销社社，或者由自己的运销机构送到城市中去销售。现在不论城市和乡村，商业都是一家独办，这样恐怕不行。城市应以国营商业为主，乡村应以供销社合作社为主，建立几个流通渠道，在统一领导下有点自由竞争，借以克服目前“官商”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会不会削弱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呢？决不会的。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合作社本大腿长，只要管理得好，它们的领导地位决不会动摇。它们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其它商业（公社商业、工厂自销、集市贸易等）只能成为它们必要的手助手和补充。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着整顿国民经济的混乱状态，提高生产力的经济效益，生产增长速度暂时降低一点是必要的。但是，大量机器设备和劳动力的闲置应当尽量避免。广开生产门路，把城乡的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确实大有可为。这一工作做得好，今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很可能超过原定计划的计划，农业也能够以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决还不计生产效果、单纯追求生产增长速度，这是对的。但是在保证生产效果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广开生产门路，把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尽可能提高一点，我们仍然应当为此而努力。

几乎都是在人民内部发生的。

阶级斗争和两类矛盾

李文博 洪珊 都 淦

关于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

张 学 品

当前理论界就我国现阶段人民内部有没有阶级斗争问题开展了讨论。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很有必要。现在我就这场讨论和争论的共点、焦点、分歧点等方面谈点个人意见。

- 一、争论中的共点
- 1、争论者都承认在我国现阶段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
- 2、争论者都承认我国现在仍然存在阶级斗争。
- 3、争论者都承认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有反映和影响。
- 4、争论者都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着无产阶级世界和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 二、争论的焦点
- 1、阶级斗争是否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 2、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是否都是敌我矛盾？
- 三、争论中的分歧点
- 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现阶段人民内部不存在阶级斗争，理由是：阶级斗争是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在我国已不存在，还说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 2、今天的阶级斗争完全等同于敌我矛盾，因此说人民内部有阶级斗争，就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现阶段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理由是：
- 1、过去习惯地讲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主要地是指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 2、现在讲人民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是因为现在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即没有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
- 3、否认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主观是想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在实际上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因为把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扩大为敌我矛盾了。

四、提出几个问题

- 1、把阶级斗争只理解为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那末在承认我国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同时，又承认我国现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 2、否认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的同志认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则是敌我矛盾”。一讲阶级斗争就是敌我矛盾，这不是很容易陷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的覆辙吗？
- 3、否认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的同志，却又承认“当前的阶级斗争与人民内部矛盾有一定的联系，并且往往互相交织在一起”。请问，这种互相交织是抽象的空洞的交织，还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交织呢？
- 4、否认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的同志认为：“如果把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影响都看作阶级斗争，那末，结论只能是：‘时时’‘处处’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请问，讲人民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影响，难道就不会被理解为“时时”有、“处处”有吗？为了避免以阶级斗争为纲，连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和“影响”也不提，岂不更好？

五、结束语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否认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容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我们建国后，在一些运动中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搞成了敌我矛盾，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是因为我们理论上承认人民内部有阶级斗争，恰恰是因为在行动上违背了这一理论，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在我们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苦头以后，不是要否定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这个事实，而是要十分注意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

从理论上讲，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一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概念；敌我矛盾同阶级斗争也不是等同的概念。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相比较而存在，它们才是一对相互对立的矛盾。阶级关系是由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不同地位来确定的。敌我关系则随着革命的性质、任务、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人民”这个概念，不同的国家和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而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既可以是敌对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是联合关系。即使它们联合的时候，也不取消它们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既表现为敌我矛盾，又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表现为根本利益一致的矛盾，也有根本利益相对抗的矛盾。列宁说过：“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地联合为一个整体。”（《列宁选集》第1卷第620—621页）这种情形历史上屡见不鲜。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正确分析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特点，把社会主义革命对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的范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从而创造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独特斗争、成功的经验。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同样地既表现为敌我矛盾，又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既不能把阶级斗争同敌我矛盾划等号，也不能认为阶级斗争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排斥、不能相容，这两种错误观念都是由于对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而产生的。

再从客观事实看，无论我们调查四川全省的情况，还是一个县的情况，都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从一九五七年以后，社会上发生的反革命案件、经济案件、治安案件等，旧的剥削阶级分子作犯罪行为的极少数，而且越来越少，近几年在有的地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多件，其中情节比较严重，判各种刑罚的只有九件；即使判刑的，不都是敌我矛盾。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去年一至九月处理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案件四百五十四件，其中反投机倒把案件五十三件，千元以上的大案件只有一起。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处理的违反党纪的案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只有一起（贪污三千元，且系屡犯）。所有这些去年以来发生的案件，方几乎没有。第二、各种案件中，依法判刑的是极少数，其中戴上“分子”帽子的又是极少数，采取教育、劳教、行政拘留等方法处理的是多数。举一个二十七万人口的彭山县为例。这个县经过去年以来的摘帽工作，现在还有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一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坏分子十一人，右派分子十人。这些“分子”不过三十多人。而一九七九年以来发生的由公安政法部门处理的各种案件一百

江萨总理宴请邓颖超副委员长

宾主热情赞颂中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新华社曼谷二月七日电 泰国总理江萨在今天的午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颂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讲话，并称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长为周大哥、邓大姐。邓副委员长对江萨总理作了高度评价。

今天的午宴，是江萨总理为中国人大代表团访泰在总理府设宴招待大厅举行的。长方形的宴会厅的四壁饰以素白的花纹，显得十分端庄、整洁。悠扬的泰国民族乐曲暂时停止时，江萨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

长先后讲了话。江萨总理说：“邓大姐此次对泰国的访问，是加强中泰两国悠久友好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他说：“如果泰中两国领导人不高瞻远瞩，不互相谅解和合作，没有建立和平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强烈愿望，那么，泰中两国在一九七五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泰中两国建立关系方面，中国人民和中国的伟大政治家、作为大哥的

已故总理周恩来阁下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泛地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邓大姐的这次访问，继承了伟大的政治家周大哥的崇高意志。我谨向你表示赞赏和敬意。”

江萨总理还请邓副委员长转达他对叶剑英委员长、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讲话中说：“总理阁下是我们熟悉而尊敬的老朋友。总理阁下以政治家的远见，一贯主张中泰友好，并为此作出了不断的努力。一九七八年初，总理阁下对我们进行的好客访问，增进了中泰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

友谊，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总理阁下，你为中泰友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邓副委员长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总理阁下的领导下，贵国政府在经济建设和发扬民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特别是贵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当前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伸张正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坚持一切国际关系准则，博得了世界上所有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赞赏。贵国已经成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

邓副委员长说：“我们十分珍惜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重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希望中泰两国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作出共同努力。”

在宴会会上，双方互赠了礼物。江萨总理拿给邓超副委员长的泰国古典舞蹈的铜人像对邓副委员长说：“这是小弟送给大姐的礼物。”他还拿着一包泰国头巾说：“这是我的夫人，您的妹妹，送给您。”邓副委员长送给江萨总理的礼物是：八十二岁的中国著名画家李苦禅作的国画《朝晖》和一个床罩。

出席这次午宴的有：泰国国会议长哈林，沙罕，国会副议长汶廷·通沙瓦，下议院副议长潘·普世南，副总理兼、纳那空和颂林·何达吉，外长乌巴蒂等。

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伟烈也参加了午宴。

邓副委员长拜会江萨总理

新华社曼谷二月七日电 邓颖超副委员长今天上午在拜会泰国总理江萨时说：“中泰两国人民兄弟般，是亲爱。”江萨总理回答说：“是的，我们是兄弟。”

今天，曼谷晴空万里。邓副委员长迎着送爽的微风微笑着走上泰国总理府豪华大厦的大理石台阶，等候在门口的江萨总理热烈握手。邓副委员长对他说：“你在昨天晚宴上的歌声，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耳边缭绕。”

拜会时，邓副委员长回忆了六日哈林议长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的亲切活跃的情景。

邓副委员长转达了叶剑英委员长、华国锋

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对江萨总理的问候。江萨总理表示感谢。

在谈到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交往时，邓副委员长说：“我国曾送过铁箱给贵国。贵国经过改进后送给了两台给我们。”江萨总理接着说：“那么，你们再改进一下，再送我们一台吧！”邓副委员长说：“加倍，送四台！”席话引起了全场一片欢笑。

拜会时在座的有：泰国国会议长哈林，沙罕，国会副议长汶廷·通沙瓦，副总理兼、纳那空以及外长乌巴蒂、巴里东央参等。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伟烈和夫人也在座。

哈林议长盛宴欢迎邓颖超副委员长

(上接第一版)

哈林议长在宴会上发表讲话，他回顾了泰国国会代表团访问期间受到邓颖超副委员长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的情景。他说：“在这次来泰国访问之际，我希望你们也会与我们一样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他说：“邓颖超阁下不仅是泰国政界重要的高级领导人，

而且还继承了你们的丈夫——总理上一位重要的伟人——已故总理周恩来阁下的意志，使中国朝着四个现代化方向迈进，更好地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最后，哈林议长用中国普通话讲：“为泰中人民的永恒友谊干杯！”

邓副委员长接着讲话，她赞扬中泰两国人民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深厚的传统友谊。江萨总理还赞扬了泰国人民在邓副委员长领导下，为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为发展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所取得的可喜可贺的成就，赞扬泰国政府和人民为接收和安置数十

万柬埔寨难民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她说：泰国“这种崇高的入道主义精神和正义行动，赢得了中国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赏和敬佩。”

邓副委员长强调指出：“我们两国人民都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了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两国人民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安。使当今的世界很不安定。去年年初，一个梦想在东南亚地区称霸的国家，公然武装侵略柬埔寨，至今还在大规模屠杀柬埔寨人民。去年年底，一个谋求世界霸权、

王幼平副外长拜会乌巴蒂外长

新华社曼谷二月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员、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今天上午在曼谷拜会了泰国外交部次长乌巴蒂·巴里央央参。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泰国，中国，团结在一起。甜蜜的歌声和乐曲，好像暖流，流进心里。

我们决不会忘记今天的欢聚，济济一堂，切切低喃。永远不要忘记它，泰中是一家兄弟。

邓副委员长和哈林议长所在的一桌最为活跃。飞行员出身的空军上将哈林虽然已六十五岁了，但精力充沛。他不时拿起快速显像照相机为邓副委员长照相。他为她照了两张餐厅桌上的彩色照片，即席赠给她。邓副委员长用英语说：“很感谢您。”接着又用汉语说：“我将带回去，作为珍贵的纪念。”

时针指着下午二时三十分，船快到曼谷了。陪同邓副委员长上船的联合商船厂董事长、空军元帅芬·隆·立他卡尼说：“今天的聚会表明，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努力促进泰中友谊日益发展。”邓副委员长将世世代代“中泰友谊非常融洽，将会世代传下去。”游船的航程快结束了，身穿浅蓝色服装的邓副委员长举杯向各座一一祝酒，并看望船上的服务员、厨师和负责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友谊的航行对泰中朋友双方都留下深刻印象。游船船长对记者说：“今天，邓副委员长乘坐我们的船，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为船主准备午餐的泰国工作人员说：“邓女士是世界上崇高的威望，也是世界人民崇敬的周总理有崇高的夫人，我早就想见到了她。今天，我是主动要求上船及其他中国客人服务的。”泰国朋友的情感深深感染了中国人代表团。邓副委员长在游船结束后说：“这次游遍了泰国河两岸风景，给我的印象是美好深刻的。感谢泰国朋友们热情的接待。”

(新华社曼谷二月六日电)

今天——多么美好和荣耀的日子，我们相亲相爱，团结在一起，

“苏联制造”

越南傀儡韩森最近率一批人马，到莫斯科去朝见苏联主子，向大老板一年来来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勃列日涅夫则给这个傀儡势力以更多的“援助”抚弄他。这一幕丑剧不仅明确了韩森的莫斯科主子贤孙的身份，也表明了这一个越南傀儡在苏联推行全球战略中担任的角色。

韩森是在越南侵略军的刺刀支持下粉墨登场的，充当河内傀儡皇帝的皇帝。而越南当局这样做又是得到莫斯科的恩惠和支持的。如果让苏联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援助和支持，这个金边傀儡早就成了历史垃圾堆里的一堆烂泥。韩森把柬埔寨弄成傀儡，也出卖给了苏联。他是苏联的傀儡，苏联的走狗。这样一个不忠于人道的货色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上宾，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最反动、最无耻的东西的本营。

苏联欣赏韩森，因为韩森也是苏联侵略扩张的产物，也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勃列日涅夫并非偶然地在欢迎韩森的宴会上宣

称，“苏联不愿意放弃七十年代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任何成果”，而且还要“继续前进”。显然，他把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从而把柬埔寨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之中，当作苏联七十年代获得的所谓“成果”之一。苏联不但“不感谢”这个“成果”，而且还要“继续前进”，向越南“前进”。

勃列日涅夫的狂妄言词清楚地表明，莫斯科当权者的胃口大得很。已经到了手，它决不放弃。没有得到东西，它要不择手段弄到手。而勃列日涅夫在欢迎韩森的时候说这些话，只能说明莫斯科今后将制造更多的韩森式的傀儡，来为苏联的“前进”充当走狗。

越南当局让韩森到莫斯科活动，目的是以此向全世界表示一下这个傀儡的所谓独立性。但是，韩森从莫斯科带回去的除了“苏联制造”这个商标之外，还有什么呢？

越南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的兴趣何在？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从去年四月中到五月中在河内举行了第一轮会议，开了五次会，毫无结果。从去年六月下旬起，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议，至今已七个多月，开了十次会，同样毫无进展，谈判陷入了僵局。

是什么原因导致僵局呢？越南代表团有任何一点解决分歧的诚意呢？早在河内举行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中国方面就提出了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问题的八项原则建议，其中的关键是反霸权原则。越南方面开始根本回避反霸权原则，后来实在回避不了，就学着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样子，接过“反霸权主义”的口号，却回避了不向外国军队上反反复复、玩弄欺哄人的才能。这种谈判态度哪里有一点诚意？

越南代表团在谈判中反复宣扬要达成一项所谓“关于双方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然而，了解中越边境局势的人都知道，去年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完成自卫还击的任务、按原定计划撤回本国以后，始终严守自己的边界。因此，在中国方面根本不存在什么停止武装挑衅的问题。在边境进行挑衅和制造紧张局势的是越南方面。如果越南当局真想解决边境的紧张局势问题，就该立即停止在边境的武装挑衅行动，不再向中国边境开枪打炮，不再向中国境内派出武装人员和特务。可是，越方的挑衅行动却增有增无已，仅在今年将近一个月里就达二百以上。可见，越南代表团在谈判中谈论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完全是混淆视听，妄图取得低毁中国的宣传效果。

从中国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起，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年。第一轮谈判在河内结束的时候，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潘赞有一段妙语，他说，中越谈判可能要花一年，也许是五年，也许是更长时间。他还说，越南方面有的是时间，准备着许多副部长。潘赞的这番话，泄露了越南当局实际上不希望中越谈判达成协议的真情。第二轮谈判开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足为奇的。

既然不想达成协议，越南代表团为什么还假借作态地要谈下去呢？

第一次，在谈判期间，越南当局在柬埔寨不断增兵，对柬埔寨军民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并且在柬埔寨边境武斗。中越谈判已经越越南当局作为掩盖他们侵略柬埔寨、威胁泰国和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的烟幕。

第二，越南代表团在北京三月多个月期间，充分利用外国客人比河内多这个条件，把北京这个谈判地点当作进行反华宣传和其反华活动的场所。代表团团长时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而单独会见外国记者，时而有几家国家的驻华记者。他通过这些活动的精力，远比用于谈判要多。他又散布大量反华言论，造谣说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挑衅，甚至公然污蔑中国领导人，又是散发歪曲中越三十年关系真相之类的反华材料；有时又攻击中国友好的人，挑拨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曾经发表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谈到越南代表团团长、副外长丁儒廉被刺邀请日本所有驻北京记者到越南大使馆举行“座谈会”的情况。丁儒廉说：“既不不是记者招待会，也不是接受采访，就算是一次坦率的座谈会吧。”“会上自始至终有啤酒、果汁、小食品、咖啡等热情招待。但中越会谈的持续状况等等，好像与他无关，他全然不知似的。”但是，丁儒廉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向日本记者宣传：“越南军队是根据柬埔寨的要求驻扎在那里的，是为了防止中国的侵略。”

这就是越南当局指令它的代表团呆在北京的兴趣所在。

两万侵柬越军在柬泰边境地区集结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曼谷消息：据西万通讯社报道，最近，大约有两万越南军队集结在柬泰边境的柬埔寨一侧，准备在越南春节前后向柬埔寨抵抗力量发动进攻。

报道说，在柬埔寨的一些越南占领军四日已到达距泰国边界只有六百码的地方。据估计，越南军队包围红色高棉的部队和跟随这支部队的老百姓赶到泰国境内，然后用地雷和观察哨封锁边界。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情报处主任、卡达潘四日说：“我们估计越南军队将进攻兰以兰自由高棉的营地。他警告说：‘进入泰国境内的任何行动都将被看作是入侵。’”

报道说，自一月中旬以来，在金边的越南侵略军已被调往马德望和柬埔寨的西部边境地区。由于越南军队在边境地区的集结，所以泰国国防部已处于全面的戒备状态。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游击队在马德望等战场继续打击进行扫荡的越南侵略军。

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一日，盘踞在马德望省的越南侵略军集中兵力，在火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普育山山区进行扫荡，妄图一举消灭这里的游击队。当地游击队同人民群众密切合作，机动灵活地打击敌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歼敌数百名，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从一月底以来，游击队还在马德望战场的诗梳风、巴韦、拜林、三洛等地不断打击越南侵略军，使敌人遭到损失。

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盘踞在桔井战场的越南侵略军，集中兵力分多路进行扫荡。当地游击队同群众一起，挖陷阱、埋地雷、袭击敌人运输线，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到今年一月二十五日，游击队已粉碎了敌人的各路扫荡。在这期间，游击队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四十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日本共同社驻东京二月七日电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大佐武部今天上午重申，日本政府不想改变承认民主柬埔寨的立场。

大佐外相是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议员询问时表明这一态度的。

大佐说，不能认为韩森执政已有效地控制了柬埔寨。那种认为民主柬埔寨方面支持了政权实体的看法是不妥当的。东盟国家也采取和日本同样的立场；在目前情况下，日本不打算改变立场。

我被接纳为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会员

新华社巴黎二月四日电 国际曲棍球联合会理事会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和三日在法国戛纳市举行。理事会一致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棍球协会为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会员，并将按照国际曲棍球协会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定，处理中国在曲棍球协会的会籍问题。

中国曲棍球协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理事会的会议。

孟加拉国总统接见我青年代表团

据新华社达卡二月三日电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三日晚在达卡接见了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刘维明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孟加拉国青年发展部长扎达卡尔·阿卜杜勒·哈米德，青年发展国务部长阿卜·卡希姆。

在此以前，一月三十三日孟加拉国青年发展部部长扎达卡尔·阿卜杜勒·哈米德会见了刘维明团长及其一行。

湄南河，泰国的“河流之母”和文明的摇篮，负载过无数船只，记录过不少历史事迹。二月六日这一天，载着中国访泰国人大代表团的游船“东方皇后号”划开浅蓝色的流水，在湄南河的水面上留下了中泰友谊史上新的重要印记。

这一天中午十二时五十分，“东方皇后号”在炮台下徐徐离开联合商船码头。船上的职工为迎接中国客人，曾作了精心的布置和充分准备，使得满船充满“朋友和亲戚”的气氛。在泰国国会议长哈林、上议院副议长甲蒙·德差东下和上议院副议长潘·普也南陪同下，邓副委员长兴致勃勃地登上游船。客人们门口挂着醒目的欢迎横幅，船上乐队奏起泰国喜庆的民间音乐。面粉厂数百名职工在岸上挥动中泰两国国旗热烈欢送，邓副委员长在客舱的窗口向欢送队伍挥手致意。岸上船中一片欢腾。

游船溯流而上，至曼谷东方旅馆码头上岸，二十多公里的航程历时两个钟头，两岸风光旖旎如画，椰林苍翠，高楼大厦在红瓦下竞相而立，间有苍鹭鸢只沿河低飞，偶尔一艘轻快的田园诗画！东岸则有不少工厂，停泊着各式轮船，在现代化工厂图案中点缀着一些农村风光和金黄相间的佛教寺庙。邓副委员长在航程中数次登岸观赏，欣赏这个热带国家的绚丽景色。她对东方旅馆的一位泰国朋友说，湄南河两岸景色很美，好象中国的海南岛，看起来很亲切。

“东方皇后号”游船的大厅设了六席酒菜，主客欢洽而坐。一支由八人组成的泰国民族乐队不断奏响中泰两国乐曲。

乐队的演奏突然停止了。诗人、曼谷联合商船厂董事长顾问拿出的即席写的一首诗请乐队的一位男歌唱家当场演唱他的诗作，歌队在座者的阵阵掌声。这位泰国男中音用抒情的音调唱道：

今天——多么美好和荣耀的日子，我们相亲相爱，团结在一起，

歌声飞过湄南河

新华社记者 杨穆俊

特写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主席宣布

将成立临时政府 罢市 抗议苏联占领的斗争

新华社伊斯兰堡二月六日电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主席布哈里丁·拉巴尼宣布不久将成立一个阿富汗临时政府以加强解放外国占领下的阿富汗国土的斗争。

拉巴尼二月六日在白沙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个临时政府将建立“在阿富汗境内的某个地方”。他还说，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正在制定统一阿富汗战斗组织的军事指挥的章程。他说，尽管苏联企图使阿富汗成为一个监狱，把“帝国主义的枷锁”套在阿富汗人民的脖子上，但是，阿富汗人民决不会接受奴役，他们决心战斗到底。

拉巴尼告诉记者，已有大批阿富汗军队参加了游击队。自从苏联入侵以来，已有两千多名苏联士兵被杀，并从敌人那里缴获了许多武器。在库纳尔省和帕克蒂亚省，苏联军队只控制着一些军事据点。巴达赫尚省、巴米安省和乌鲁兹冈省等地区，游击队同苏军双方正进行斗争。他说，苏联军队的士气低落，在许多地方，苏联士兵抛弃了先进武器。他指出，苏联八万多军队占领阿富汗，这不只是阿富汗的灾难，而是危及世界安全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国际问题。他呼吁伊斯兰国家的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展示了一些阿富汗游击队缴获的苏军文件和苏联官兵的身份证。

据新华社巴格达二月七日电 据路透社二月六日从喀布尔报道，阿富汗南部约有二十万居民的最大城市坎大哈举行不定期罢市，抗议苏联军队出兵阿富汗。

报道说，这次罢市是由地下抵抗组织号召举行的。从一月三十日开始的这次罢市直到本周仍在继续进行。据报道，这个城市的五个主要市场和其他参加罢市的店主受到了威胁，他们被警告，如果他们拒绝开业，将被罚款一千阿富汗尼（约二十五美元）。报道说，一位商店老板说：“只有俄国人离开后我们的商店才开张营业。”据报道，早些时候，阿富汗西部大城市赫拉特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罢市活动。

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北约部长理事会上，伦斯秘书长曾预测：在“混乱和困难的”七十年代结束以后，下一个十年将对盟国提出更加严重的挑战”。然而，七十年代尚未过去，就传来了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的隆隆炮声。北约人士每谈及此，颇有不幸言之之感。

人们在谈论中普遍认为：北约在七十年代面临的挑战，必将在八十年代继续存在和发展，例如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军事力量将进一步增强，它在第三世界的侵略扩张活动将有增无减，西方国家的能源危机也将继续深化等等。伦斯先生说，北约面临的严重威胁是“苏联继续不断、毫无约束地在全世界规模上加强力量”以及第三世界的“日益动荡不稳”。他中肯地指出，这两种挑战是互相影响的。

“苏联的最终目标是称霸全世界”，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罗杰斯将军认为这是北约应当从“阿富汗事件”中吸取的主要教训。他不只一次地呼吁人们仔细研究一下它对北约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此间人士大致有如下看法：

第一，在欧洲地区两大集团重兵对峙的情况下，苏联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第三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赖以生存的原料和能源供应地区如波斯湾。几年来的事实说明，这是它的既定政策之一，苏联入侵阿富汗既不是什么“权宜措施”，更不是什么“防御性行动”。几天之内，苏联的军事力量往南推进了八百公里，日益逼近西方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阿富汗已成了苏联直接控制下的印度洋、波斯湾大举扩张的一块新的“踏脚石”。这不能不引起北约特别是西欧国家的严重忧虑。

第二，苏联多年来演唱的缓和高调，只不过是它扩张实力和势力范围的烟幕，是束缚北约国家的紧箍咒。从这西欧某些抱有缓和幻想的人来谈又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罗杰斯将军说得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教育了北约，“显然，苏联对缓和的解释并不阻碍它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缓和”不应仅仅意味着北约国家单方面的“克制”。

阿富汗事件和北约面临的挑战

新华社记者 潘六

第三，苏联向国外投军军事力量的能力已大大加强，战争冒险性日益增加。一位西方记者说，苏联的胃口越来越大，这对北约是个危险的信号。人们看到苏联的因素在增长，现在又重演起八十年代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来。一般认为，未来的欧洲战争很可能首先作为外国侧翼的中东、波斯湾地区爆发。罗杰斯将军呼吁北约“必须使火药保持干燥，并且作好准备去对付威胁。”

第四，苏联的对外侵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只要它认为有利，就会明目张胆地侵犯一个主权国家。人们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军事侵略活动不但越出了他们所谓的“大家庭”范围，而且从使用代理人发展为直接出兵占领，虚构的侵略借口也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苏联入侵阿富汗与一九六八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样，采取了施放缓和烟幕，选择时机，以“保护”为名进行突然袭击的诡计伎俩。凡此种种，何等酷似当年的希特勒！曾经种地过法西斯侵略之苦的欧洲人民对此有着特殊的体验。不少有识之士恰当地把“阿富汗事件”比之于当年墨索利尼占领阿尔巴尼亚和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

的确，苏联霸权主义的野蛮行径进一步撩拨了人们的眼晴。美国总统卡特说，“阿富汗事件”大大改变了他就任以来对苏联的看法。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得西方“毫无幻想的余地”。一个多月来，他们和北约其他国家首脑纷纷发表谴责苏联的声明和讲话。约总部的多次开会研究，并呼吁盟国对苏联采取各自的自卫措施。尽管各国做法不同，看法也不尽一致，但随着苏联侵略扩张目的进一步暴露，对于对付八十年代更加严重的挑战，北约各国深感“盟国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目前北约各国正在加紧磋商和协调对苏政策和步骤。据报道，一项为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而进行分工合作的长期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新华社布鲁塞尔二月六日电)

施密特向卡特表示在苏侵阿形势下 法国西德同美国站在一起 美国对法国西德首脑会谈公报表示欢迎

据新华社华盛顿二月六日电 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今天说，西德总理施密特向卡特总统表示，在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形势下，西德和法国领导人同他站在一起。

鲍威尔告诉记者说，昨天下午卡特总统同施密特总理通了电话，了解施密特总理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最近举行的会谈的情况。在这次通话中，施密特强调“在困难形势下，施密特可以对总统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有信心”，他还要求卡特“告诉美国人在这种形势下，两位领导人同他站在一起”。

他说，许多国家已经理解到苏联侵略阿富汗“不仅是对西方联盟的共同利益的共同威胁，而且也是对国际稳定和反侵略共同阵线的国际利益的共同威胁”。

据新华社巴黎二月五日电 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今天在项联合声明中指出，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是“不能接受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施密特在巴黎举行第三十五次法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这项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给那个地区的稳定和平时带来严重的危险”，他们为“必须立即结束这种干涉”。

联合声明指出，两国首脑认为，当前的危机势必给世界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他们重申两国忠于大西洋联盟，并决心履行西方所承担的义务。

联合声明说，两国领导人注意到，“由于阿富汗事件，缓和已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加不确定，因此，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阿富汗”。声明表示，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同它们的盟国协商采取在这种情况下的必要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维护国际稳定”。

日本响应美国召开西方七国外长会议建议

会议将商讨对苏联入侵进行制裁

据新华社东京二月七日电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首脑六日表示，日本政府将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关于召开西方七国外长会议商讨对苏联进行制裁的建议。

报道说，美国的建议是六日向日本外府正式提出的。这七个国家是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会议准备在二月下旬举行。

报道说，美国政府是想通过召开七国外长会议，消除美国和西欧各国、美国和日本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采取制裁措施问题上的国际分歧。

《每日新闻》报道说，这个会议可能召开，将对以阿富汗问题为中心的当前国际形势产生很大影响。

这家报纸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参加国在对苏联采取制裁措施问题上的步调，其中包括莫斯科奥运会问题。

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首脑六日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奉行全方位外交已不适合。”

这家通讯社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斯兰国家崛起等一系列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对于苏联的看法正在变化。报道说，外务省首脑还表明，在现在的环境下，“日本政府和国家都不能更加敏感地考虑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今后，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和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

让我们都来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又有马来西亚、肯尼亚、利比里亚参加抵制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政府将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除非非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军队。马来西亚政府二月六日晚发表的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支持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作出的在全部苏联加入阿富汗撤出以前，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议。声明说，内阁已建议马来西亚奥委会不要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除非非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

据新华社内罗毕二月六日电 肯尼亚业余体育协会主席萨姆森·奇翁基今天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由于俄国人入侵阿富汗破坏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基

础，肯尼亚运动员将不参加在紧张的和不安全的气氛下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他表示，肯尼亚业余体育协会无条件地支持肯尼亚总统莫伊关于重新考虑在其他地方举行奥运会的意见。

一些前部长和参议员打电话给肯尼亚通讯社和写信给记者，表示支持莫伊总统的这一号召。《民族日报》的社论说：“正当阿富汗人准备为保卫祖国而献身的时刻，我们第三世界的人不应该同正在阿富汗杀害无辜平民的，也就是主持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去同乐。让我们都来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吧！”

据新华社德黑兰二月六日电 据伊朗《世界报》今天报道，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严厉批评未经政府许可擅自抓走国家指导部长纳塔瓦尔·米纳希的事件。

巴尼萨德尔总统是在接见《世界报》记者时提出这一批评的。据这家报纸报道，米纳希是昨天深夜被抓走的。在这以前，占领美国使馆的学生在伊朗电台和电视台公布了一些文件，指控这位部长向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世界报》说，巴尼萨德尔总统认为“这些叛徒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谴责这是“在政府之上制造一个政府”，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它的司法安全，它将面临崩溃。”

巴尼萨德尔批评这位部长的人“甚至不尊重革命委员会”，他们深夜冲进一位部长的家里，没有向革命委员会报告就把他抓起来。”他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政府官员热情和有信心地继续工作？”他还批评伊朗电台和电视台未经负责的官员允许，就让学生们不断地使用电台和电视台。

革命委员会成员巴扎尔甘也在今天早晨谴责了这些学生。

意义重大的谅解

本报评论员

印度外交部外秘书拉·达·沙姆于二月四日起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印巴双方就联出阿富汗、两国关系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六日，哈克总统接见了沙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冷淡甚至紧张。就是在这次会议中，双方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人们从沙姆访问巴基斯坦的行程上，看到印巴两国是可以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为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而作出努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沙姆访问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的原因所在。

特别是，沙姆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访问巴基斯坦的，而且从已有的消息看，通过会谈，各方都表示了友好的愿望。用沙姆的话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和谅解。可以肯定，这次印巴双方的会谈对南亚局势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有句成语：唇亡齿寒。巴基斯坦是阿富汗的紧邻，是由南亚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现在，苏联军队已经到了巴基斯坦的门口。苏联对巴基斯坦的威胁已是活生生的现实。印度也对此感到关切。沙姆在六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地说，双方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在国际上使用武力或干涉别国内政是不能容许的。沙姆还说，印度并不反对对巴基斯坦接受美国援助加强防御能力。我们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两个重要的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关系在当前的形势下所取得的可喜进展感到欣慰。

当然，印巴改善关系，苏联肯定是不高兴的。人们注意到，苏联正在利用巴基斯坦接受外国援助以增强防御力量一事大作文章，极力挑拨印巴关系，同时把自己装扮成印度的“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但是，这种高调是以在阿富汗的炮声为条件的，又能有多大的欺骗作用呢？以印度民族利益和南亚的和平与安全为重的有识之士是能够辨明是非的。他们看到，面对巴基斯坦所受到的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支持和援助巴基斯坦，这不是针对印度的，更不会给印度造成什么威胁，相反只会对制止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这对印度是有利的。印度总理英·甘地最近说，印度永远也不会支持任何一个国家派遣军队到别国去。她还说：“俄国人要增加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不一定只是在阿富汗，而且是在整个东南亚。这是十分危险的。”印度领导人的这些主张和看法，对于加强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是很有利的。

哈克说将向英·甘地提出倡议 巴印采取联合行动迫使苏从阿撤军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二月六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天对正在这里访问的一批印度记者说，巴基斯坦希望印度和国际社会一起，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为此目的，巴基斯坦准备和印度一起采取任何联合行动。

齐亚·哈克总统说，他将给印度英·甘地总理写信，告知他对阿富汗事件的看法以及关于任何可能采取的联合行动的倡议。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谈到印度对苏联行动所采取的立场时，齐亚·哈克总统说，我们最近通过外交手段和其他途径得到了来自印度方面“非常肯定的重新保证”。他说：“我们期望印度将和我们一起来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齐亚·哈克总统说，关于巴基斯坦被阿富汗游击队基地在阿富汗发动颠覆活动的基地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反巴基斯坦的宣传。他说，巴基斯坦只是根据人道的原则，向来自阿富汗的兄弟“提供避难场所”。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天津文教体育用品分公司

China National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Imp. & Exp. Corp., Tianjin Stationery & Sporting Goods Bran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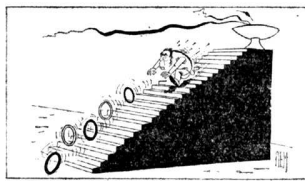
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成立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天津文教体育用品分公司并正式开始营业，经营原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所经营的各种纸张、文教用品、体育用品、中西乐器、胶鞋、雨鞋等进出口商品，有关业务未了事宜均移交本公司继续进行。欢迎国际贸易界人士继续往来，友好合作，拓展贸易。

天津市和平区辽宁路172号

电报挂号：24249 电传号：22506 TJLIP CN

China National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Tianjin Stationery & Sporting Goods Branch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he 1st January 1980 with business activities started from the very day, handling such commodities as Paper & Boards, Stationery, Sporting Goods, Chinese & western Instruments, Rubber/Canvas Footwear and Rain Shoes/Boots hitherto handled by China National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Imp. & Exp. Corp., Tianjin Branch. All the outstanding affairs pertaining to said commodities have been simultaneously handed over to the Stationery & Sporting Goods Branch for attention. Continued contact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y firms/personnels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eign trading circle are hereby cordially invited to promote and develop trade.

Postal Address, No. 172 Liao Ning Road, Tianjin China
Cable Address, "STASPORT"
Telex Number, 22506 TJLIP CN



图中的火炬代表奥运会火炬；人物是勃列日涅夫；五个铁环代表奥运会会徽。

原载法国《费加罗报》

